

邓小平理论研究

邓小平对苏外交中的国家利益思想

钱 婧 朱新光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邓小平国家利益思想是在国际形势新变化和国内社会新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并在处理中苏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它主要体现在: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置于首位,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作为新时期发展中苏(俄)关系的结合点,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发展两国关系等。深入理解邓小平对苏外交中的国家利益思想,有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全面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

〔关键词〕 邓小平; 中苏关系; 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999(2013)03-0112-04

国家利益是一国制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是衡量一国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客观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期国家利益思想。这一思想不仅贯穿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展的外交实践过程,而且对于当前及今后我国的对外政策具有深远影响。

一、邓小平对苏外交中国家利益思想的形成条件

邓小平是我国第一位明确提出以维护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领导人。1978年他重新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国内外环境发生的新变化是其国家利益思想形成的重要前提。

1.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国际形

势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逐渐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他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这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达到了某种平衡,相互形成制约,谁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虽然两国仍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已经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他具体分析了四种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力量:(1)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不希望战争,(2)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也不希望战争,(3)美苏人民也不支持战争,(4)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减少爆发战争的危险。根据这一判断,邓小平改变“一条线”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打牌”的政策,即“奉行独立自

〔收稿日期〕 2012-12-28

〔作者简介〕 钱 婧(1990-),女,江苏高邮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朱新光(1965-),男,湖北武汉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新兴国家政治与外交。

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²⁾。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判断深刻反映了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改变了过去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为我国及时调整与苏联的关系指明了方向。而改善中苏关系本身就是维护世界和平，是时代的召唤，有利于增进新时期我国的安全利益。

2. 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的工作重心

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³⁾在这里，他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统一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而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富强，就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来自苏联的威胁不消除，中苏关系不改善，中国将很难得到真正的国家安全，也就无法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显然，调整对苏政策是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的前提，是实现我国“最根本的利益”的需要。

3. 改善对华关系成为苏联的当务之急

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苏联为实现全球称霸的野心，利用其竞争对手美国处于日趋衰落的被动处境，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性的全球战略。苏联大肆进行侵略、渗透和扩张，在援越侵柬和入侵阿富汗后，外交上处于空前孤立的态势。同时，战后几十年来美苏一直激烈对抗，特别是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给苏联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极大地妨碍了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建设。⁽⁴⁾而日本、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则不断增强，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受到动摇。中国先后与日本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是触动了苏联的敏感神经，让苏联感到惴惴不安。苏联甚至猜测，美、日、中正在逐渐形成一个集团，这样苏联相对于美国微弱的优势

将彻底丧失。于是，苏联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战略：与中国的对抗只会削弱苏联自身的力量，使美国在美苏争霸中渔翁得利、占据优势。

为此，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向中国发出了改善双方关系的重要信号。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了谨慎而积极的反应，表明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将“听其言，观其行”。改善中苏关系既是时代的召唤，又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且苏联主动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邓小平自然务实变通，调整我国的外交政策。

二、邓小平国家利益思想在处理中苏关系中的体现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基于对中苏关系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分析，牢牢把握国家利益原则，直接掌控中苏关系的改善进程，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的篇章，并确定了日后中俄关系的基本走向。

1. 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置于对苏关系的首位

任何国家一旦失去主权，就根本谈不上捍卫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国家主权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即国家能够生存的基础上。⁽⁵⁾因此，国家主权和安全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⁶⁾，始终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1982年，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在各个领域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邓小平抓住这个时机，及时调整了对苏关系的战略决策，提出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苏联在中苏边界和蒙古驻扎重兵、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占领阿富汗。其中，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个障碍尤为突出，因为中国认为苏联帮助越南打仗，而中国帮助柬埔寨抵抗力量打仗，这使得双方实际上处于对立状态，如果任其发展，就很有可能升级为两国的直接对抗。⁽⁷⁾这充分表明，邓小平极端重视国家安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性问题上具有坚定的原则立场。为此，中苏两国先后展开了十二轮磋商。

邓小平指导着谈判的每个细节，在重大原则上毫不放松。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苏联方面也不断地采取一些实际行动，三大障碍基本得到解决。最终双方于1989年打破坚冰，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安全威胁的解除使中国能够腾出手来聚精会神地从事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中国在努力获得一个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极其可喜的成果。

2. 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作为新时期中苏(俄)关系的结合点

国家的经济利益范围很广，主要包括维护本国领土和领海的资源和能源主权，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争取有利的国际贸易条件和国际金融制度等。^[8]经济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力量，是国家利益最基础性的内容。在许多西方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地区实现经济腾飞之时，我国却由于中苏对抗、全面备战以及“文革”等原因错失了快速发展的机会。邓小平在1978年以后多次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9]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同时，把经济利益放在突出的地位，积极开展包括与苏联在内的经贸合作。

1982年，中苏重新修订了运输贸易协定，加入了集装箱运输条款，并且不再以日本作为两国之间贸易的媒介。与此同时，中国经东北运往欧洲的货物可以途经苏联远东地区，而苏联也可以经中国的东北将货物运到朝鲜，甚至还可以通过中国境内运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1983年4月，两国在哈尔滨签署了关于恢复边贸问题的协议，使关系恶化以来变坏的边贸得以恢复正常。^[10]1984年底，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正式访问中国，双方签订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协定》。1985年7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两国签订了《关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〇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和《关于在中国建设和改造工业项目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86年3月，阿尔希波夫再次访华，进一步推动和落实两国在经济、贸易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11]在中苏关系解冻过程中，两国经贸合作对双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在实际上为解决两国间政治难题创造了条件。

苏联解体后，尽管俄罗斯独立之初在外交上一度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但我国仍十分重视中俄经贸关系，两国签署了24个在各领域合作的政府间及部门间的协定或文件，开展易货贸易、劳务合作、企业投资等经济活动。随着中俄经贸合作的迅速扩大，两国关系不仅延续了中苏关系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3. 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别发展中苏(俄)关系

冷战时期，国际上往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只会阻碍世界和平的发展，加剧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缓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减弱。对此，邓小平曾明确表示“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12]他还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13]。这番话其实是向外表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改革与新思维”，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然而，这次尝试失败了，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等改革内容使苏联国内越来越与社会主义相背离，从意识形态上使中国感到距离，但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因素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这段时间里，中国还尽可能给予当时处于困难中的苏联以经济援助。在认识到苏联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邓小平于1990年3月提出了进一步保持和发展来之不易的中苏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4]邓小平确定的这一原则是实现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平稳顺利过渡的思想和政策基础。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不干涉苏联、东欧事态，尊重苏联人民的选择，先后与苏联解体后出现的15个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尤其是中俄两国关系在中苏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成为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周边

环境的重要步骤。

三、邓小平对苏外交中国家利益思想的现实启示

邓小平对苏外交中的国家利益思想不仅是处理中俄关系的行动指南,而且对于我国全面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 立足长远,把握全局,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出发点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上,用什么样的最高准则来指导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曾经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作为最高准则发展对外关系。实际上,意识形态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它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邓小平高瞻远瞩,胸怀全局,超越意识形态的羁绊,将国家利益作为新时期指导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外交行动准绳。当前以及未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国都应牢记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坚持从维护中俄关系大局的高度出发,着眼两国的共同利益,努力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处理中日、中印、中越等双边关系时,我们也应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既要坚定地维护我国的主权独立、保障领土完整、保证人民安宁和生存,又要从长远角度出发,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正确处理现阶段分歧,寻找和扩大利益共同点,力争实现互利双赢的局面。我们将以实际外交行动表明,中国的发展决不是世界的威胁,而是世界的福音。

2. 加强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

21 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实质就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重要标

尺,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正是由于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展望未来,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都得依靠更加强大的综合国力。因此,我们必须继续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提供有力保障。

3. 相互尊重,友好合作,不干涉内政,努力实现共同利益

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但在许多领域内也存在共同利益,必须相互尊重,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邓小平在承认国家之间有着利益冲突的同时,注意到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他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发展经济、缓和双边关系的共同利益作为纽带,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也奠定了中俄友好关系的基础。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提升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中国与其它国家在维护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跨国犯罪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的迫切需要。我们坚信,只要中国继续遵循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相一致的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着力加强在共同利益上的友好合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攻自破,也必然会获得一个更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外交格局。

(参考文献)

- [1] [2] [6] [9] [13]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7, 128, 3, 356, 168, 353.
-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2-163.
- [4] [11] 陈小沁. 邓小平外交思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J]. 东欧中亚研究,1999,(5).
- [5] [8] 宋新宁,陈岳. 国际政治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0-29, 116.
- [7] 谢益显.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4)[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379.
- [10] 孔寒冰. 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367-368.
- [12]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42.

(责任编辑:赵小波 胡学举)